



《善齋吉金錄》重印本及稿本(詹茂華攝)



本文作者(左)和时任上海图书馆馆长马远良(右)在香港与刘永龄先生的合影(1997年7月21日)

(1912—2005)等,对刘永龄等人发扬先人遗泽之义举均给予了高度评价。

史树青先生在来函中认为:《善齋吉金錄》重印,“誠为我国历史学界、图书馆界、文物考古界、古文学界大事。其有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刘氏祖德之弘扬,阙功甚伟,而该书增加多种索引,尤便后学”。夏涿先生在来函中指出:“贫寒出身的学者治古文字学,最困难的是无力购买图书资料,在中山大学当研究生五年,分配到武汉大学后五年,差不多十年功夫用于摹写《三代吉金文存》和全部出版的甲骨文拓片,仅能满足起码的研究工作。印赠宝书的义举实有益斯学,发扬了刘老先生的爱国乐施的高风亮节。”

2000年1月10日,《善齋吉金錄》重印本首发式暨学术座谈会上海图书馆隆重举行。与此同时,赠送给国内外的数百部重印本陆续寄出。

《善齋吉金錄》重印本广受国内外学界好评

流,期间曾与刘永龄在香港见面,刘永龄对重印本的印刷质量提出了具体意见,并委托其堂弟刘璠龄具体督办。由于1998至1999年的梅雨季节及特大洪水的影响,给重印本的防潮防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当时已制成的2000只函套由于有了不少霉点,只能全部重做。1998年7月,刘璠龄、童芷珍与我三人同往富阳进行重印本的质量检查,并于7月9日与华宝斋补签了“《善齋吉金錄》质量检验标准协议书”。1998年11月,刘永龄来函提到香港将派人来富阳对重印本按质量检验标准逐本验收;

1999年4月,刘璠龄也曾两次专程到富阳检查督办重印事宜。在此期间,刘璠龄与蒋放年之间在重印本问题上曾发生过严重的分歧,后双方换位思考,终使重印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为了在重印本中让读者了解重印缘起,我们请刘永龄于1985年5月写了重印前言,并请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当时已八十高龄的林星垣先生(1913—2011)用毛笔抄写。同时我们建议在重印本中附上刘体智像。

1999年8月,经过近两年的努力,500部《善齋吉金錄》终于全部按要求重印完成。重印本与初印本相比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印刷装帧有了明显提高,如书角用青色花绫等;二是书前增加了刘永龄“重刊前言”及刘体智先生像;三是全书增加了索引一册,并于每册书根处印有书名卷次,便于检索利用。根据刘永龄的意见,华宝斋为每部重印本特制了一个纸箱,以便寄运,上写有:“善齋吉金錄(四函二十八册附索引一册);刘体智收藏青铜器图录;香港刘永龄赠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经办;浙江富阳古籍印刷厂印刷装订。”上海图书馆先后用密封车专程将这些书运至上海图书馆书库中予以妥善保存,以便随时寄运。

1997年12月,王贻梁、王铁、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梁颖与我共同拟定了《善齋吉金錄》重印本准备赠送的国内外学术机构和个人名单,这一名单曾请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1928—2004)、副馆长陈佩芬(1935—2013)审核签字,又经副馆长汪庆正(1931—2005)审阅,作了一些增补。我们向国内外寄发了500封信函,其中包括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大学、研究所、出版社等学术机构和个人,还通过上海图书馆网站将这一信息广而告之,并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国内外有关方面进行了联系。从1998年1月至5月,共收到国内外各类函件269件;其间,刘永龄也曾根据我们提供的名单再次发函,曾收到回信80多封。

《善齋吉金錄》的重印并赠送全球学术界的义举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赞誉。1998年1月,兰州大学图书馆最先寄来了要求赠送的信函,其后的来函几乎遍及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全国各省市和地区,如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机构在来函中对受赠重印本表示了热忱的期望。国外如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等机构也先后来函,希望受赠此书。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如陈炜湛、杜迺松、吴浩坤(1930—2017)、黄盛璋、李学勤、裘锡圭、石兴邦、史树青(1922—2007)、松丸道雄、夏涿(1923—2006)、许嘉璐、王宇信、张光裕、张政烺

《小校经阁遗芬》编撰始末

《小校经阁遗芬》为刘璠龄主编的《和乐堂丛书》之一。刘璠龄1934年2月出生于上海,1959年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动机系,1963年毕业后任教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1994年退休。2005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刘璠龄谈到他主编《小校经阁遗芬》书的缘由:

祖父(刘体智)收藏规模宏阔,品种丰富,甲骨、铜器、书画、瓷器、善本、砚台、古墨、鼻烟壶这些方面,他都有涉猎。祖父没有把他的众多藏品留给子孙,然而他对收藏的喜爱却无形中遗传到我身上。想当年的小校经阁,藏着五百个箱子,内有书籍十万册,甲骨分藏在一百五十只红木盒中,有些还附有木盒座,铜器、瓷器、字画随处可见,俱极精美,连我家吃饭的餐具,也有不少印着“乾隆年制”的字样。我1938年到1951年都随祖父住在小校经阁所属的花园洋房里,儿时在这儿度过的美好时光,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认识到,收藏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所谓收藏家,只不过是暂时保存了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宝物,有义务、有责任为这些珍宝找一个好归宿。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渐渐有了起色,我开始从鸟食缸、象棋

(下转14版) ➔

← (上接12版)

1998年3月在给笔者的来函中认为:“《善齋吉金錄》现在是最难得的金石书之一,在于敝斋,虽然已收藏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金文著录,但是除了《善齋彝器图录》之外,该书还没有得到。”可见《善齋吉金錄》于20世纪末期在全球学术界已属不可多得的稀见文献。

上海图书馆1997年7月曾首次赴香港举办“上海图书馆古文献精品展”,办展期间,为感谢刘体智文献捐赠的义举,上海图书馆馆长马远良与我前去拜访了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刘体智之孙、刘璠龄堂兄刘永龄先生。在会面中,刘永龄提出欲承继祖业,出资重印《善齋吉金錄》,以赠送国内外学术机构与学者,并希望由上海图书馆来具体承办此事。1997年8月,我将所调查的大陆线装古籍印刷厂的情况以及重印《善齋吉金錄》的计划函告了刘永龄。1997年10月,刘永龄在来沪参加第八届全国运动会期间到上海图书馆,与时任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王鹤鸣、馆长马远良等见面,双方决定了《善齋吉金錄》的重印及赠送工作具体委托刚刚成立的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承办,由于当时笔者正在上海图书馆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兼历史文献中心主任和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

长,分管历史文献工作,于是此事便由笔者具体负责落实。

1997年12月8日,我代表上海图书馆与浙江富阳华宝斋古籍印刷厂厂长蒋放年(1950—2003)签署了“上海图书馆与华宝斋关于印刷《善齋吉金錄》的协议”,协议中规定,《善齋吉金錄》的印刷必须按照原书纸张与装帧要求,但又有所提高,如其中书页用白色宣纸,书角用青色花绫,书面呈古铜色,函套用蓝布面四合套及骨签。1997年12月,上海图书馆在馆藏中选择了一部品相较好的《善齋吉金錄》印本作为印刷底本送至浙江富阳。为方便使用者检索,我们要求重印本在书根处每册印上书名及卷次,以便插架时方便检索。

《善齋吉金錄》原书没有总目录,只是在每卷之端列有该卷目录。为方便读者,1997年11月至1998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王贻梁教授、王铁教授与我三人共同编制了《善齋吉金錄总目》《善齋吉金錄文字考释索引》《善齋吉金錄姓氏、人物考释索引》《善齋吉金錄专名考释索引》等,并合为一册,成《善齋吉金錄索引》,附于原书的第一函之首。

《善齋吉金錄》的重印工作也曾一波三折。1998年5月,我们将华宝斋所印样书寄香港刘永龄,同年5月,适逢上海图书馆古籍部修复师童芷珍与我同赴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交